

# 《醒世姻緣傳》朋友倫理敘事的經世寓意

陳怡媛\*

## 摘要

《醒世姻緣傳》作為明末清初的小說，以王振亂國的史事勾勒出世變背景，據史以「演義」，透過史事「重寫」，反映出自身同處世變之現實處境，並思考世變的解決之道。作者透過友倫敘事尋求世變成因，將世變原因歸結於重利思想所導致的友倫衝擊，倫理道德不彰導致家國秩序混亂。選擇良朋作為度脫者，當承襲了陽明心學思想中對於「良朋裨益修身」之思考。透過良朋助修身的情節設計，「修身」讓道德秩序得以重振，「友倫重建」亦使得五倫得以再度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力量。友倫重建的關鍵在於個人的道德自覺，若無此道德自覺，將導致良朋遠避。胡無翳由利益之交轉為良朋，為朋友解厄的急難相助之義，也呈現出「義／利」最終的價值判斷，體現出以義為主的理想友倫。倫理重建後家國呈現出一片祥和景象，反映出作者藉由倫理重建傳達出內心的經世願望。

關鍵詞：醒世姻緣傳、世變、演義、朋友倫理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



## 一、前言

《醒世姻緣傳》作為一本世情小說，胡適曾讚譽《醒世姻緣傳》的寫實精神，徐志摩也將之譽為「中國五名內的一部大小說」。<sup>1</sup>胡適凸顯了其寫實性，強調小說在描摹世情方面的貢獻。<sup>2</sup>《醒世姻緣傳》與《金瓶梅》關係密切，《金瓶梅》的版本主要分為「詞話本」與「繡像本」兩大類，胡衍南考察兩者間的承繼關係，發現《醒世姻緣傳》與「詞話本」話語表現較為相近，《醒世姻緣傳》承襲了詞話本「俗」的語言表現及書寫內容，與從「繡像本」、《林蘭香》至《紅樓夢》「雅」的一派發展殊別。<sup>3</sup>李志宏則認為「詞話本」與「繡像本」均呈現出「演義」<sup>4</sup>思維。比較「詞話本」與「繡像本」演義思維之異同，發現詞話本保留「妾婦索家，小人亂國」的家國評論被刪去：

（說散本、繡像本）不僅將「高楊童蔡四個奸臣」結黨營私、擅政亂國的政治因素抹去，同樣地，也將詞話本第七十回有關「妾婦索家，小人亂國」的比附評論刪去。如此一來，說散本《金瓶梅》寫定者將寫作重心由「女禍」、「小人亂政」的互文隱喻書寫，轉向以西門慶一生財色欲望爭逐及其家庭興衰的因果報應書寫為主。<sup>5</sup>

由詞話本到繡像本，展現出不同的「演義」思維，「詞話本」聚焦於女禍導致家國興衰；「繡像本」聚焦於個人生命自覺。「詞話本」與《醒世姻緣傳》語言形式上較為相似，《醒世姻緣傳》對於「家國同構」的結構亦有所繼承，故本論文從「演義」的角度剖析《醒世姻緣傳》。

<sup>1</sup> 徐志摩：〈《醒世姻緣傳》序〉，原載《新月》第4卷第1期（1931年），後亦載於1932年亞東圖書館版《醒世姻緣傳》。徐志摩：〈《醒世姻緣傳》序〉，《徐志摩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95年），第8集，頁396-415。

<sup>2</sup> 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988-1049。

<sup>3</sup> 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代長篇世情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sup>4</sup> 「演義」即在既有的史事之上，透過歷史材料的選擇、排列，寄託個人的歷史闡釋，從而找尋歷史之外的詮釋空間。關於演義的研究，可參譚帆：〈「演義」考〉，《文學遺產》第2期（2002年3月），頁101-144。楊緒容：〈「演義」的生成〉，《文學評論》第6期（2010年11月），頁98-103。陳維昭〈論歷史演義的文體定位〉，《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00年3月），頁33-43。劉勇強：〈演義述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93年4月），頁47-51。

<sup>5</sup> 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頁49。

關於《醒世姻緣傳》的版本問題，現存版本主要有二：一是十行本，正文半葉十行，行廿五字；另一是十二行本，正文半葉十二行，行廿五字。<sup>6</sup>本論文採用三民書局所出版之小說，「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同德堂本為底本進行標點校注，以同治庚午遞修同德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黃肅秋先生校注本、齊魯書社出版的徐北文先生整理本為參校本」。

《醒世姻緣傳》托於明代正統（明英宗），歷經景泰（明代宗），最後至成化（明憲宗）年間。成書年代有明末崇禎說、<sup>7</sup>順治十八年<sup>8</sup>及康熙中後期說<sup>9</sup>三種說法。《醒世姻緣傳》成書年代的三種說法囊括在「崇禎」至「順治」年間，據趙園所界定之明清之際為崇禎末至康熙初，<sup>10</sup>故我們將《醒世姻緣傳》視為明末清初之作品，學者亦將《醒世姻緣傳》作為反映濃厚易代精神之作品。<sup>11</sup>《醒世姻緣傳》作者題名西周生，對於其人學界至今未有定論，或言蒲松齡，<sup>12</sup>或言丁耀

<sup>6</sup> 關於醒世姻緣傳的版本問題，參吳燕娜：〈《醒世姻緣傳》的版本問題〉，《中外文學》第 17 卷第 2 期（1988 年 7 月），頁 97-107。楊春宇：〈《醒世姻緣傳》的研究序說——關於版本和成書年代問題〉，《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2003 年 6 月），頁 155-170。

<sup>7</sup> 主張「明末崇禎說」有王守義、曹大為、胡萬川、段江麗等。王守義：〈《醒世姻緣傳》的成書年代〉，《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61 年 5 月 28 日。曹大為：〈《醒世姻緣傳》的版本源流與成書年代問題〉，《文史》第 2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17-238。曹大為：〈《醒世姻緣傳》作於明末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1988 年 8 月），頁 64-71。鄒宗良：〈《醒世姻緣傳》康熙成書說駁議——《醒世姻緣傳》寫作年代考之一〉，《社會科學》第 6 期（1989 年 12 月），頁 39-44。鄒宗良：〈《醒世姻緣傳》的歷史地位與寫作年代上下限的推考〉，《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9-1380。胡萬川：〈關於《醒世姻緣傳》的成書年代〉，《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263-273。

<sup>8</sup> 主張「順治十八年」有徐朔方、田璞、徐復嶺、楊春宇等。他們從環碧主人的〈醒世姻緣傳弁語〉入手，據小說內容推敲「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的「辛丑」當指「順治十八年」。參徐朔方：〈論《醒世姻緣傳》及其與《金瓶梅》的關係〉，《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他》（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161-181。田璞：〈《醒世姻緣傳》作者新探〉，《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1985 年 10 月），頁 77-82。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濟南：齊魯書社，1993）。楊春宇：〈《醒世姻緣傳》研究序說——關於版本與成書年代的問題〉，《明清小說研究》第 2 期（2003 年 6 月），頁 155-170。

<sup>9</sup> 主張「康熙中後期」有胡適、孫楷第，此派由於相信作者為蒲松齡，因此成書年代便落於康熙中後期。參孫楷第：〈與胡適之論醒世姻緣書〉，《滄州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06-237。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論學近著》（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 年）。

<sup>10</sup>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42。

<sup>11</sup> 「西周生寫作於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緣傳》，呈現了重要的明清易代之際山東眾生相」。參劉瓊云：〈妖魔、動物、精怪：《醒世姻緣傳》中的記惡書寫〉，《清華中文學報》第 11 期（2014 年 6 月），頁 106。

<sup>12</sup> 首倡者為胡適，後有學者呼應胡適說法。趙茗狂：〈醒世姻緣考〉，收入《足本醒世姻緣傳》卷首。（台北：世界書局，1968 年）。徐北文：〈醒世姻緣傳簡論〉，收入《醒世姻緣傳》卷首（山東：齊魯書社，1980 年）。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譚正璧《中國小說發展史》亦主此說。

亢，<sup>13</sup>或言賈冕西，<sup>14</sup>或言章丘文士。<sup>15</sup>全書以袞州—濟南方言寫成，敘述發生於濟南、山東一帶之事，以果報為框架，講述一個兩世惡姻緣的故事。

浦安迪提出四大奇書當屬「文人小說」之概念，認為文人在世代累積的小說材料之上，進行有意識地重寫。浦安迪翻轉了五四以來將明清章回視為通俗小說的立場。<sup>16</sup>由浦安迪的主張來看，四大奇書均為作者之精心安排，而四大奇書共處於「世變」的背景，便反映出作者對於歷史材料有意運用，並非是無意地巧合。當文本運用歷史材料書寫時，便是對歷史進行重寫，材料的選擇、排列上都反映了作者的主觀意識。<sup>17</sup>文學作品不可避免地投射現實的影子，<sup>18</sup>四大奇書作者聚焦於「世變」，便反映了現實同處於世變的困境中，作者藉由世變書寫反映出自身的現實觀察與焦慮。文人藉由世變框架的設置，以歷史的「重寫」寄託個人的歷史反思，並回應共同的時代命題，李志宏認為四大奇書作者有意藉由小說的書寫，反映世變中個人的救世情懷與政治期望。<sup>19</sup>

《醒世姻緣傳》開篇書寫明英宗時期宦官擅政之朝政亂象：

<sup>13</sup> 王素存：〈醒世作者西周生考〉，《大陸雜誌》第3期（1958年8月）。田璞：〈醒世姻緣傳作者新探〉，《河南大學學報》第6期（1985年10月），頁77-82。張清吉：《醒世姻緣傳新考》（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14</sup> 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

<sup>15</sup> 孫愷第至胡適信中已開其端，金性堯進而明確化，徐朔方亦主此說。金性堯：〈醒世姻緣傳作者非蒲松齡作〉，收入《金性堯全集》第四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徐朔方：〈論醒世姻緣傳及其與金瓶梅之關係〉，收入《論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及其他》（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

<sup>16</sup>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四大奇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

<sup>17</sup> 海登懷特為後現代歷史敘事學的代表學者，其學說主張如下，「論述歷史修纂的理論家一般都認為，所有歷史敘事都包含著不可簡約或無法抹滅的闡釋因素。歷史學家必須闡釋他的材料以便建構形象的活動結構，用鏡像反映歷史進程的形式……因此，一個歷史敘事必然是充分解釋和為充分解釋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實和假定事實的堆積，同時既是作為一種闡釋的一種再現，又是作為對敘事中反映的整個過程加以解釋的一種闡釋。」參（美）海登·懷特：〈歷史中的闡釋〉，見氏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63。

<sup>18</sup> 互文性理論認為小說與現實彼此具有互文性。此外，巴赫金時空體之概念也指出小說與現實間之互文性，小說反映了小說創造的當下所處之現實時空，同時體現出現實困境與個人思考，「在人類發展的某一歷史階段，人們往往是學會把握當時所能認識到的時間和空間的一些方面；為了反映和從藝術上加工已經把握了的現實的某些方面，各種體裁形成了相應的方法。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係和空間關係相互間的重要聯繫，我們將之稱為時空體。」四大奇書以世變為書寫對象，使小說作為反映特定歷史、現實的時空體。參（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俄）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見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74。

<sup>19</sup> 李志宏：《「演義」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原來司禮監太監王振，原任文安縣儒學訓導，三年考滿無功，被永樂爺閹割了，進內教習宮女。到了正統爺手裡，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那權勢也就如正統爺差不多了。<sup>20</sup>

小說描述明英宗對於王振百般寵愛，使王振得以把持朝政，最終國家大權旁落。王振急於滿於一己之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竟慫恿皇帝御駕親征，導致皇帝被俘、國家動盪，此即歷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藉由土木之變，作者為我們建構出「世變」的背景。與四大奇書異曲同工地將「世變」作為背景，反映出對於現實世界同處世變的關注，作者同樣面對世變的處境，故體現出同樣的關注課題。四大奇書作者面對世變，急於尋求世變的解決之道，或探尋歷史變化發展的規律，或透過個人心性之修養，藉此找尋秩序重建的可能，傳達了「由亂反治」的政治期望。四大奇書展現出濃厚的歷史意識以及演義思維。

「演義」即文人在歷史之外尋求詮釋空間，將歷史通俗化敘述的同時，也寄寓個人的歷史思考。《醒世姻緣傳》作者面對世變，藉倫理敘事展開演義，透過倫理失序的描寫體現對於世變的觀察，筆者從「朋友倫理」的角度切入，觀察作者有意藉由「利益之交」的書寫，傳達「友道之喪」的思考，回應了易代之際文人對於背師棄友現象的憂慮。作者藉由「友道之喪」的思考，尋找世變成因，當為「倫理不彰」所導致。商業發展對於「倫理」所產生之衝擊，在易代之際達到最高峰，易代的生死危機尤考驗著友情之堅固性。作者透過友倫的書寫，反映出「重利」思想如何取代倫理價值，價值觀的轉易更被視為儒家文人視為世變的成因。浦安迪也發現《醒世姻緣傳》作者雖透過諸多倫理亂象來勾勒世變樣態，然更重要的是背後傳達出儒家文人「倫理重建」之經世籲求。<sup>21</sup>受到浦安迪的啟發，筆者欲深究文人在面對世變時，如何找尋世變的成因所在？如何透過「倫理重建」的方式達到救世的目的？藉由倫理道德之重建，傳達「由亂反治」的政治期望。

本論文第二節首先梳理小說中對於友倫崩解之描寫，並藉此勾勒出世變樣態，藉此反映作者將友倫崩解視為世變成因的寫作意識；第三節分析從友倫崩解到重

<sup>20</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臺北：三民書局，2000年），頁66。

<sup>21</sup>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逐出樂園之後：《醒世姻緣傳》與17世紀中國小說〉，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26。

建問的根本原因，藉此體現出重振倫理的根本方法；第四節描繪出作者心中友倫的理想圖像，藉由「義／利」的辯證，最終完成友倫重建的理想，儒家文人以道德倫理作為家國秩序的表徵，友倫的重建也與結尾的天下太平聯繫起來，傳達出作者的政治期望。

本論文奠基於浦安迪「文人小說」的概念以及「演義」研究成果之上，意在思考四大奇書之外演義系譜的拓展性，李志宏建立起四大奇書的演義系譜，筆者欲在四大奇書之外，尋求延伸的可能，以期使明清小說之演義系譜臻於完善。

## 二、世變成因：重利思想下的友倫衝擊

傳統友倫歌頌朋友之「義」，朋友間因道義相結合，更甚者能為彼此犧牲性命。明代的友倫故事，如〈吳保安棄家贖友〉、〈羊角哀捨命全交〉更是對朋友之「義」的最高體現，甚至將朋友置於妻、子之上，<sup>22</sup>然而何以明清之際的文人如此重視「友倫」？明清易代之際，文人賦予了朋友嚴肅的意義，「儒學、理學之士賦予了友之一倫以嚴肅的極端性，他們的論交尤其注重其道義基礎」。<sup>23</sup>從傳統的「朋友有信」到為道義犧牲性命的極端作為，逐步體現出對於朋友的更高標準，「朋輩倫理的另一個重要範疇是『義』，即道義。朋友之間要講究道義，這是比誠信更高一級的道德要求，它規定了更大的責任與義務」。<sup>24</sup>

相較於傳統的友倫，《醒世姻緣傳》中刻畫的朋友關係為何？以下先簡單整理小說中的話語表現，再進一步探討此表現背後的思想底蘊。晁思孝透過梁、胡二人，希望藉由王振之權勢，為自己取得仕途上的順遂。父子與二人的關係全然建立在利益的交換上，透過人際紐帶的利益交換，為自己取得利益。晁思孝是在梁、胡二人毛遂自薦，希望幫助晁思孝透過金錢疏通取得官位：

梁生道：「京中當道的老爺們，小人們服事的中意也極多，就是吏部裡司官老爺，小人們也多有相識的。這都盡可做事。……」晁知縣笑問道：「你且說這個門路卻是何人？」梁生道：「是司禮監王公那裡來，極是穩

<sup>22</sup> (美)黃衛總：〈晚明朋友楷模的重寫：馮夢龍《三言》中的友倫故事〉，《人文中國學報》第18期(2012年12月)，頁225-238。

<sup>23</sup>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甘肅社會科學》第1期(2006年1月)，頁78。

<sup>24</sup> 趙毓龍、劉磊、陳麗平著：《明清小說倫理敘事研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112。

當。」晁知縣驚問道：「我有多大湯水，且多大官兒，到得那王公跟前？煩得動他照管？」梁生道：「正是如此，所以要老爺假便宜，跟去的人不要來掣肘。老爺只管如意罷了。」<sup>25</sup>

晁思孝發現二人並非常人後，便一改以往的態度，「卻說梁生、胡旦因有勢要親眷，晁家父子通以貴客介賓相待，萬分欽敬。晁老呼梁生的字為安期，呼胡旦的字為君寵」，<sup>26</sup>由晁思孝態度的極大轉變，便可知梁、胡在晁思孝心中僅是利用的對象，是因為二人有利用價值，晁思孝才對其尊敬萬分，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必定冷眼相待。發現二人有利用價值後，便呼二人之字展現親密，甚至以賓客之禮待之，由此見其勢利。

太監王振由於受到正統爺寵愛，因此大臣爭相巴結，「閣老遞他門下晚生帖子；六部九卿見了都行跪禮；他出去巡邊，那總制巡撫都披執了道旁迎送」。<sup>27</sup>蘇錦衣、更是由於與王振相親而得以致仕高升：

他做教官的時節，有兩個戲子，是每日答應相熟的人。因王振得了時勢，這兩人就「致了仕」，投充王振門下，做了長隨，後又兼了太師，教習梨園子弟，王振甚是喜他；後來也都到了錦衣衛都指揮的官銜，家中那金銀寶物也就如糞土一般的多了。這兩個都是下路人，一個姓蘇的，卻是胡旦的外公；一個姓劉的，乃是梁生的娘舅。」<sup>28</sup>

大臣們甚至認王振為祖宗、義父，只希望能夠取得權位，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正因為望能從王振身上取得利益，內心有所算計，因此關係親密非常：

定要喪了那羞惡的良心，戴了鬼臉，千方百計，爭強鬥勝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大家齊心合力，挺持得住了，難道那王振就有這樣大大的密網，

<sup>25</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64。

<sup>26</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108。

<sup>27</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66。

<sup>28</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66-67。

竭了流，打得乾乾淨淨的不成？卻不知怎樣，那舉國就象狂了的一般，也不論甚麼尚書閣老，也不論甚麼巡撫侍郎，見了他，跪不迭的磕頭，認爹爹認祖宗個不了！依了我的村見識，何消得這樣奉承！<sup>29</sup>

然而在王振失勢後，世態炎涼毫無保留地體現，以往稱兄道弟的朋友們落井下石，親密之態蕩然無存：

後來王振狠命的攬掇正統爺御駕親征，蒙了土木之難。正統爺的龍睛親看他被也先殺得稀爛，兩個親隨的掌家劉錦衣、蘇都督同時剁成兩段。……卻道當初那些替他舔屁股的義子義孫，翻將轉那不識羞的臉來，左手拿了張稀軟的折弓，右手拿了幾枝沒翎花的破箭，望著那支死虎鄧鄧的射。……若再依我的村見識，他已落在井中不上來了，又只管下那石頭做甚？<sup>30</sup>

當朋友間利益相關時，便親密非常，然而當利益不相關後呢？此親密是否真實恆常？當下對於彼此的需要相當迫切，然而在利益關係消失後關係依舊如常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原本看似親密的友誼，在利益衝突時會產生何種變化？當中又反映出作者對於友誼的何種關懷與思考？王振失勢時其黨羽遭到追捕，胡、梁二人欲投奔晁思孝，然而晁思孝的反應卻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與晁大舍結義了兄弟，老晁或呼他為賢姪，一切家人都稱呼梁相公胡相公，晁夫人與珍哥都不迴避的。聞說王振與蘇劉兩個錦衣都被殺了，正在追論這班奸臣的親族，晁老父子這日相待梁胡兩個也就冷淡一半。……梁胡兩個與晁老閒敘，說起那錦衣衛各堂多有相知，朝中的顯宦也還有親眷，把梁胡二人又重新抬敬起來。<sup>31</sup>

原本胡、梁二人以為晁思孝念在以往幫助他的情面上，會暗助二人藏匿，然

<sup>29</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212。

<sup>30</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212-213。

<sup>31</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108-109。

而晁思孝卻認為私藏朝廷欽犯，可能危害自身安危，加上胡、梁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無法替晁思孝謀得官職，故晁思孝的反應十分現實殘酷，立即冷淡起來，往日情誼蕩然無存。從一開始的親暱萬分，到現在的冷漠無情，友誼轉變之速令人不勝唏噓。晁思孝再度發現胡、梁仍有可為後，又再度親密起來，由此，我們發現以「利」結合的友誼看來不可依恃，毫無堅固性可言，朋友之間也淪於物化的關係，僅將對方當作利用對象，一旦失去功用，便狠心拋棄。由此可見，以「利」結合的友誼，一旦在利益關係消失，或是利益衝突時，友誼便蕩然無存。

作者描述了「利益之交」因利益衝突而疏遠、交惡的故事，背後蘊含了對於「義／利之辨」的思考。明代以來由於商業的發展，以「利」相交者愈來愈多。商業的繁榮使得友倫產生質變，「士人所批評的『市道之交』，固不必與商業、市場直接相關，他們的有關感受，卻可能得諸市場、商業的提示」，<sup>32</sup>原本對於倫理道德的追求，受到欲望的驅使，而產生改變。人際網絡更成為追逐財富的工具。明代以後由於商業的發展，友倫逐漸變質，以「利」代「義」的交友標準出現，天下盡利益之交。文人也對此感到憂心，他們觀察到友倫逐漸變質，李贄就曾說所以「交難」，因了「天下盡市道之交」、「其交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疏；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sup>33</sup>而友倫的思考在「世變」生死交關之際更被突顯出來，成為文人思考的重要課題。

相較於以「義」相交者，明清時期由於商業發展蓬勃，「治生」觀念已然取代「倫理」追求，<sup>34</sup>友倫因此飽受衝擊。文人對於明代因商業發展而興盛「利益之交」感到憂慮，人們利用朋友之人際紐帶以達到權力、地位的追求，此友誼有別於傳統以「義」結合之友誼，傳統友誼由於情感、人格追求及道德倫理之基礎，相對來說更為穩固，然而利益之交卻失去了穩固的情感、道德基礎，僅僅建立在利益的「暫時」結合上，因此友誼也隨利益的消失而改變。到了明代對於朋友道義的道德人格之追求已然轉變，取而代之的，是以「利益之交」暫時結合的關係，而此種關係全然建立在「欲望追求」的目的之上。學者考察明清小說中的朋輩敘事時，提出利益之交的脆弱性，「心靈的契合不以利益為紐帶，表面的意氣投合，背後卻以利益為驅動力。一旦了利益連繫消失，連表面的意氣投合恐怕也難以維

<sup>32</sup>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頁 80。

<sup>33</sup> 明·李贄：《續焚書（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02。

<sup>34</sup>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9。

持」。<sup>35</sup>此種以「利」代「義」的追求，使得友倫產生了質變。

明代商業發展所導致之友倫衝擊，主要展現在利益之交興盛的風氣上，小說藉由對利益之交的書寫，傳達自身對於友道之思考，此思考是來自於所身處之世變語境。晁思孝父子對於朋友的急難相拋，在世變之背景下，凸顯朋友是決定我們死生存亡的關鍵，在關鍵時刻會遭到叛賣，抑或是對我們伸出援手？交友之道便成為易代之際文人思索的重要課題。小說將棄友的故事置於世變下，凸顯了作者對於現實的反思，「危機時刻的友情，並非都與危機有關，但確實有一些故事，打上了那個時代的醒目標誌」，<sup>36</sup>危急時刻友情的書寫反映了明清之際特殊的時空語境，當時文人如此關注此類題材，也代表了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生死存亡之考驗，朋友是否能庇護自己，成為能否存活的關鍵，「危機與患難，也使得『慎交』這一尋常原則有了關涉生死的嚴峻性」。<sup>37</sup>在這樣的情況下，「擇友」變得相當重要，若是識人不明，便可能在危急時後遭到出賣。

小說設定於世變背景，描述利益之交急難相拋，背後反映了作者自身之現實焦慮，意即身處易代之際，<sup>38</sup>親見賣友求榮者屢見不鮮，「所謂『刎頸之交』，見利害則能刎彼友之頸耳……當其時與『友』有關的最沉痛經驗，無過於『見利害則能刎彼友之頸』的吧。在易代的恐怖中，『背師賣友』應所在皆有」<sup>39</sup>因此作者透過朋友急難相拋的書寫，聚焦於危急時刻的友情，背後傳達出對於易代之際「賣友」現象的焦慮與反省。「賣友」現象與「重利」思想密切相關，凡是以利為依歸，當有利可圖時，朋友相對而言便輕如鴻毛。隨時面對生死的威脅，也讓他們對於友倫價值轉移現象深刻反省，對於以利相交導致叛賣之事深感痛心。作者探究世變之際叛賣朋友的成因，歸因於商業發展對於友倫衝擊，導致朋友交往產生了重利益、輕道義的轉變。而友倫的思考在世變之際生死交關之際更被突顯出來，成為文人思考的重要課題。

作者藉由利益之交的描寫，思索世變的成因，並將之歸結於「義／利」的選擇上，商業發展導致人們對於朋友的選擇上重利輕義，義／利道德倫理觀的改易，是導致世變的關鍵。世變之際，朋友叛賣之事層出不窮，「重利輕義」思想所衍

<sup>35</sup> 趙毓龍、劉磊、陳麗平著：《明清小說倫理敘事研究》，頁 127。

<sup>36</sup>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頁 77。

<sup>37</sup>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頁 81。

<sup>38</sup> 《醒世姻緣傳》成書年代的三種說法囊括在「崇禎」至「順治」年間，據趙園所界定之明清之際為崇禎末至康熙初，故我們將《醒世姻緣傳》視為明末清初之作品。參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542。

<sup>39</sup>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頁 80。

生之問題被凸顯出來。作者透過朋友的書寫，最終為世變尋得成因。

### 三、友倫重建的關鍵：誠心悔悟

朋友是四倫之外，能夠制衡心性者，當宗法血緣無法發揮功效時，友倫便產生「彌縫四倫」的功效，「伸者為神，屈者為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莊事也。人之精神，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伸於朋友。如春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四倫非朋友不能彌縫」，<sup>40</sup>朋友間基於平等互愛的情誼交往，不會受制於尊卑的束縛，而能更自由地規勸對方。<sup>41</sup>有良朋的勸諫，個人心性便不會流於放蕩。朋友的幫助是修身所不可或缺的：

從大學修齊治平的本末之論而言，修身正是一切完美社會關係與秩序的起手處，而講求這起手的大本工夫又不能不倚賴朋友間的擇善輔仁，因此朋友之倫可能被高舉為其他四倫所倚賴的道義之屬。<sup>42</sup>

晁源的父親未能對兒子產生制約的作用，因此便需透過良朋的協助，讓其有機會回歸正軌。然而，晁源四周所環繞者有富家子弟，「到得十一月十日卯時前後，那十餘家富戶陸續都到了教場，也都盡力打扮，終須不甚在行」，<sup>43</sup>都是一些不知禮法的新發戶，「這伙人說的無非是些奸盜詐偽之言，露的無非是些猖狂恣縱之態，脫不了都是些沒家教、新發戶混帳郎君」。<sup>44</sup>毫無一人能對其勸諫，也讓他的個人意志無限上綱，最終不幸身亡。因此晁源縱慾身亡的下場，在宗法血緣未能發揮制衡作用，朋友也無法作為「彌縫四倫」的角色，因而無可避免地走向

<sup>40</sup> 明·陳繼儒：〈友倫小敘〉，《寶顏堂秘笈》第 24 冊（上海：文明書局，1922 年）。

<sup>41</sup> 呂坤提及父子、兄弟、夫婦、師徒規勸之難在於存在尊卑之別，「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為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參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漢學研究》第 17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100。

<sup>42</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 97。

<sup>43</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13。

<sup>44</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10。

敗德亡身的下場。

良朋原本能夠幫助晁源，然而他的敗德行為卻也讓他們不敢恭維，使得良朋遠避。邢臯門便是一良朋代表，邢臯門對晁源的觀察如下，「生他的慈母尚且要尋了自盡，羞眼見他，我卻如何只管戀在這裡？這樣刻毒，禍患不日就到了。我既與他同了安樂，怎好不與同得患難？若不及早抽頭，更待何日！」<sup>45</sup>晁源的所作所為，讓良朋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作者著意描寫晁源富家子弟之友的縱慾，表達出當友倫無能作為助修身，人心終為欲望所誘之憂慮。

小說如何描寫主角心性的轉變？小說中將晁源「癡人不省」對照狄希陳「發恨持戒」，點出了良朋重新歸返的主因。良朋的出現必須倚賴個人心性之培養，唯有有德之人，方能吸引良朋的到來，反之，則避而遠之。相較於晁源，狄希陳經歷諸般艱險，因此也認知到修心的重要性，深知唯有如此，方能脫離惡境，當胡無翳告誡若要度脫解厄，則必須謹記時刻修身，狄希陳則展現出修行的決心與意志：

我知道師傅是個聖僧，我豈有不依師傅之理？師傅與我擇個吉日，我就在佛前受戒，不敢有違。虔誦《金剛寶經》，務足一萬卷之數，就在寺中久住，不敢私自回家。必求師傅的顯應。<sup>46</sup>

狄希陳之心性在歷經諸多磨難後已有轉變。誠心悔過、真心贖罪，由於歷經了諸般艱險，狄希陳因而有了悔悟的契機，「狄希陳也是那艱難險阻備細嘗過的人，所以也肯發恨持戒。淨了身體，吃了長齋，每日早起晚住，虔誦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sup>47</sup>對於前世對於慾望的追求都能夠放下，並真心悔悟，「戒了殺生，持了長齋，絕了貪嗔」。<sup>48</sup>也正是悔悟的契機，才讓良朋能夠助他超度識罪。相較於晁源執迷不悟，歷經艱險的狄希陳願「發恨持戒」，便由此產生「良朋歸返」之契機，自願修行也讓良朋的幫助更為順利，否則僅有良朋勉力誦經、告誡修身，對於狄希陳之度脫解厄仍毫無助益，因此關鍵仍在當事者的決心及意志。要言之，良朋便會願意親近。因此最根本之處還是在於「修心」。

<sup>45</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上）》，頁 231-232。

<sup>46</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2。

<sup>47</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2。

<sup>48</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1。

#### 四、 由利益之交轉為良朋：以義代利的友倫重建

小說作者特意安排朋友作為度脫者，背後有其特殊用意。敘事者也揭示了其用心：

這狄希陳若不是得了他前世的良朋超度，仗了菩薩的力量，素姐還有三十年的魔障，攪害得他九祖不得昇天，兄弟不能相顧，家業飄零，身命不保，怎能有這般的結果，活到八十七歲善終？所以有詞為證：交友須當交好人，好人世世可相親。請君但看胡無翳，不恨前生拐騙銀。相解救，說緣因，冤家懺悔脫離身。若非佛力神通大，定殺區區狄小陳。<sup>49</sup>

敘事者強調了「良朋」的正面力量，正因與胡無翳交好，因此得以曉晰前世今生，最終才能識罪悔過、免於災厄，由此可見「良朋」是修身成德的輔助者。「交友須當交好人，好人世世可相親」，點出作者背後的經世用意，意即對於友倫重建的期望，唯有「良朋」方能親近、長久，也才能裨益德性、救急救難。良朋對人影響之鉅，能在危急之時伸出援手，解救朋友於苦難之中，甚至一生受益。也正是因為「良朋」的存在，狄希陳才得以善終。友倫作為彌縫四倫的角色，作者在此話語脈絡下，刻意安排良朋作為度脫者，意在強調友倫作為血緣宗法外維繫秩序之力量。在父親無能作為家庭秩序時，友倫還能作為最後一道防線。

作者特意用「良朋」作為度脫者，敘述良朋度脫主角、力誠修身，實承襲了陽明學對於友道之思考。即使在儒家思想中，孔子也對於朋友能夠「輔仁」有所討論，孟子認為「友也者，友其德也」，強調結交有德性的朋友，意在對於德性有所裨益、滋養，能夠見賢思齊。由此可見，傳統儒家對於「朋友」一倫，對於修身的助益多有關注。《醒世姻緣傳》作為明末清初之作，雖以佛教為框架，然對於「修身」與「五倫」之重視反映出濃厚的儒家思維。陽明學者面對晚明儒家倫理受到商業衝擊所導致的價值觀轉移，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等道德實踐方法，仍是以維繫儒家倫理道德為目標。《醒世姻緣傳》同樣面對世變之際倫理道德不彰的現實，與陽明心學之文化語境類似。故本文也由陽明心學的角度切入，思考小說友倫書寫背後所承襲之文化內涵。

---

<sup>49</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7。

「師友」的砥礪被陽明學者視為「修身成聖」的必要元素。陽明心學雖強調「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重視內修，但卻認為無師友輔助無以成聖，「陽明學者們卻不認為成聖的歷程可以不經師友扶助而得，相反的，他們極力強調朋友乃修身成德不可缺乏的一個要素」。<sup>50</sup>陽明學者如此重視朋友，蓋因是修道成聖不可或缺之要素，「綜觀王陽明及其弟子們的文集可發現，他們不僅在觀念上強調朋友之於成德的必要性，實際生活也多優游於師友的講學當中。」<sup>51</sup>傳統儒家對於朋友的期待，「亦師亦友」，將師友並提，便是強調交友需著重德性、才學，方能從朋友身上學習，故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

陽明學者認為友倫重要性在於能夠擇善輔仁、相互切磋學問，即孔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會」活動與陽明學者「友論」息息相關，朋友能夠於講會中相互切磋道德、學問，相較於四倫是不可或缺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相對於朋友較少出現在講會中：

這些明代中期最重要的陽明學者在論到朋友對講學的重要時，並非只在觀念上強調朋友對道德修養的重要，更是直接指涉著當時陽明同志聚講的講會活動。強調友倫的重要除了反映當時學者求友心切、優游於同志講會的生活方式。<sup>52</sup>

此外，陽明學者認為朋友是「修身成德」不可或缺的夥伴：

這種對家庭的重視即使在強調朋友之倫的明代亦沒有改變，大多數強調友倫重要性的學者也並未刻意凸顯朋友這外於家族的人際關係與其他家族內人際關係的對比，而通常是並提它們的重要性。但是從大學修齊治平的本末之論而言，修身正是一切完美社會關係與秩序的起手處，而講求這起手的大本工夫又不能不倚賴朋友間的擇善輔仁，因此朋友之倫可能被高舉為其他四倫所倚賴的道義之屬。<sup>53</sup>

<sup>50</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漢學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頁93。

<sup>51</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80。

<sup>52</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80-81。

<sup>53</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97。

若能有益友，則「見賢思齊」，益友具有擇善輔仁的正面作用。由此可知，在陽明心學之影響下，作者藉由主角狄希陳前世作惡，此世受盡折磨的故事，特意安排朋友作為度脫狄希陳的關鍵角色，將最終維繫秩序的希望寄託於友倫身上，回復友倫作為彌縫四倫之地位。晁源敗德亡身之前世故事，凸顯作者對於「修身」之關注，作者認為修身為亂世立身之本，晁源敗德導致身亡家破，在世變的背景之下，敗德成為治亂興亡的成因，作者透過「良朋助修身」的情節安排，意在凸顯修身的重要性，藉此重整混亂的世道人心。同時也透過將「良朋」設定為解救者，來傳達倫理重建對於重整人心之重要性。友倫與四倫最大的不同在於平等性，因此規過也無需顧忌尊卑上下，若父親無能作為約束個人心性之力量，此責任便落於朋友肩上，《醒世姻緣傳》安排朋友作為最後的解救者，意在凸顯朋友作為宗法秩序混亂時的修補之能。透過朋友相互規勸之道義，回歸傳統友道對於朋友有過必規之美德，五倫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傳統友道的回歸成為社會秩序重整之方法。

朋友對於修身的助益，在陽明學中尤為強調。即使在儒家思想中，孔子也對於朋友能夠「輔仁」有所討論，孟子認為「友也者，友其德也」，強調結交有德性的朋友，意在對於德性有所裨益、滋養，能夠見賢思齊。由此可見，傳統儒家對於「朋友」一倫，對於「修身」的助益多有關注。此蓋作者安排「良朋」作為修身輔助者之緣由。以下梳理陽明心學對於朋友的思考，裨益我們了解小說運用「良朋」之話語背景。

「師友」的砥礪被陽明學者視為「修身成聖」的必要元素。陽明心學雖強調「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重視內修，但卻認為無師友輔助無以成聖，「陽明學者們卻不認為成聖的歷程可以不經師友扶助而得，相反的，他們極力強調朋友乃修身成德不可缺乏的一個要素」。<sup>54</sup>關鍵之處便在於無師友的切磋指引將流於閉門造車、「冥悍自信」：

成德卻不被認為可以靠個人力量而完成，是必須倚靠朋友間互相幫助才可能……朋友講學對修身成德的幫助不僅在互相激勵使不致散漫怠懈而悠悠度日，更是在講明致良知的真義，使不致落入「認氣作理，冥悍自

<sup>54</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 93。

信」，或「自以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不自知其違道遠矣」的景況。換言之，朋友之於成德不只是在強化一個人的修德志向而已，更關係著這個人是否能正確地再成聖的道路上不斷長進。<sup>55</sup>

這也是補足陽明心學之缺陷，即「人人自是」的隱憂，「陽明學者之重視友倫正是有著互補制衡其理論中易流於人人自是之隱憂的作用。」<sup>56</sup>師友間的討論成為檢視自身是否成聖之客觀標準，相較於獨學無友，更能保證成聖的必然。要言之，陽明學者如此重視朋友，蓋因是修道成聖不可或缺之要素，「綜觀王陽明及其弟子們的文集可發現，他們不僅在觀念上強調朋友之於成德的必要性，實際生活也多優游於師友的講學當中。」<sup>57</sup>傳統儒家對於朋友的期待，「亦師亦友」，將師友並提，便是強調交友需著重德性、才學，方能從朋友身上學習，故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而朋友補足了三綱中的上下權威性，更為強調平等，因此作為子女較難規勸父母，可能會被批評不孝，然而朋友不同，因而能夠相互規勸，使德性歸正、迷途知返。父子、兄弟、夫婦、師徒規勸之難在於存在尊卑之別，唯有朋友是朝夕相處者，就連老師都無法如此，因此朋友對於德性、學問的成就有極大重要性。

胡、梁二人的身份從「利益之交」轉為「良朋」，背後的意涵耐人尋味。胡、梁過去是幫助晁思孝結交朝中宦官，取得官位者，彼此為「利益之交」，由於利益而暫時結合。胡、梁二人遭難後，晁思孝父子過河拆橋，導致胡、梁被朝廷搜捕卻無人接濟，展現出「利益之交」的本質，即當利益無關後，情意也煙消雲散。幸好，由於晁夫人的善心，使得胡、梁得以在寺中維持基本生活，晁夫人顧念朋友恩情，以「義」相待，讓胡、梁相當感念，使得友誼有了轉化的可能，最終由「利」轉向「義」，胡、梁開始誦經為晁家祈福。後來，梁片雲以投胎春鶯之子的方式，報答晁夫人；胡無翳成為幫助狄希陳修身的「良朋」，使其得以讖罪解厄。知悉因果後，胡無翳作法，讓狄希陳得以免除三十年受素姐荼毒。

作者親見「利益之交」橫行，透過「良朋」理想關係之塑造，顯見作者「倫理重建」的渴望。從「利益之交」轉為「良朋」，原本「利盡交絕」的脆弱友誼，得以因為晁夫人的「知恩報德」之義，得以轉換為「義友」，義友對於狄希陳最終修德成善有莫大助益。在友道淪喪的時代，友誼產生了由「義」向「利」的變

<sup>55</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 93-94。

<sup>56</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 94-95。

<sup>57</sup>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頁 80。

質，原本堅固的友誼再也無法以倫理道德作為支撐，如今變成「利盡交絕」的脆弱關係，是故無法成為能夠彌縫四倫的基礎。透過晁夫人對於胡無翳的照顧，以「義」待之，行當行之事，而不因利慾薰心而迷失本性，轉化了胡無翳原本可能報復的行為，反而成為點明因果的重要人物，最終超度了狄希陳，讓其得以善終。對於因果的闡明，更是告誡狄希陳「修身」之重要：

胡無翳道：「此番管你有效。只是你要聽我的指教，從此戒了殺生，持了長齋，絕了貪嗔。這都要在菩薩案下立了終身的誓願，再度誠持誦《金剛寶經》一萬卷，自然福至禍消，冤除恨解，還叫你知道前生做過之事。」

58

回應了陽明學者友倫之語境，認為「朋友裨益修身」，胡無翳的出現不僅為狄希陳「說緣因」更是提醒他務必「修身」。作者安排「良朋」提醒狄希陳「修身」，對於崩壞的友倫塑造一理想樣態，由「利」轉向「義」，復歸朋友間相互砥礪、重視德性修養之傳統友倫，透過友倫重整亂世之人心。透過良朋胡無翳對於狄希陳危急相救，樹立起義友之典範，也為世變中重利輕義之問題找到解方。作為五倫之一的友倫，更具有輔助四倫以及作為四倫之外維繫社會力量的作用。作者面對友倫逐漸崩壞，利益之交橫生的世道人心，心中仍藉由「友倫重建」的情節設計，寄託儒家文人的願望。透過友倫重建，作者替世變倫理失序的現實尋得解方：

自從成化爺登基以後，真是太平有象，五穀豐登，家給人足，一連十餘年都是豐收年歲。但天地運數有治有亂，有泰有否，當不得君王有道。成化爺是個仁聖之君，所以治多亂少，泰盛否衰。<sup>59</sup>

藉由友倫重建，家國呈現出一片祥和景象。

<sup>58</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351-1352。

<sup>59</sup>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下）》，頁 1207。

## 五、 結語

《醒世姻緣傳》在世變背景下，透過友倫書寫體現對於世變之際倫理不彰的觀察，主要反映在利益之交的書寫上，明代商業發展對於友倫產生衝擊，呈現出「以利代義」的友倫轉向。此外，友倫也無能作為彌縫四倫、制約個人心性之力量，使得個人意志無限擴張，終至縱欲亡身。世變之際作為五倫之一的友倫已失去維繫倫理道德秩序的功能。作者親見世變下友倫崩解的現實，透過「修身自覺」的強調，凸顯個人的道德主動性。並在個人擁有道德自覺後，安排良朋相助，讓狄希陳能夠脫離遭受妻子虐待的厄運，良朋點破前世因緣，解釋妻子報仇之緣由，也力誠狄希陳務必修持德性，由此，狄希陳在良朋相助下終脫厄運。「朋友裨益修身」承襲了陽明心學之文化語境，並將之化用於小說當中。對於修身的強調，傳達出作者對於世變倫理道德不彰之解方。良朋於急難中解救狄希陳的情節設計，展現出朋友之「義」，樹立出義友之典範，也使得友倫產生「以義代利」之轉向。裨益修身的良師益友，回應了傳統儒家對於朋友的期待。藉由友倫重建，結尾呈現出家國新生的樣態。《醒世姻緣傳》中的友倫書寫，為作者面對世變的現實處境，透過倫理重建企圖達到家國秩序重建的目的。友倫重建的情節安排實反映了作者的經世期望。

## 徵引書目

### （一） 古籍

- 隋·王通撰、王雪玲校點：《中說》，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臺北：三民書局，2000年。
- 明·李贄：《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明·陳繼儒：〈友倫小敘〉，《寶顏堂秘笈》第24冊（上海：文明書局，1922年）。

### （二） 今人著作

#### 1、單篇論文

- （日）平田昌司：〈審視文本：讀《醒世姻緣傳》〉，收入曹虹、蔣寅、張宏生主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逐出樂園之後：《醒世姻緣傳》與17世紀中國小說〉，樂黛雲、陳珏編選：《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美）黃衛總：〈晚明朋友楷模的重寫：馮夢龍《三言》中的友倫故事〉，《人文

- 中國學報》第 18 期，2012 年 12 月，頁 225-238。
- (美)海登·懷特：〈歷史中的闡釋〉，見氏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 (俄)米哈伊爾·巴赫金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見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 王守義：〈《醒世姻緣傳》的成書年代〉，《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61 年 5 月 28 日。
- 王素存：〈醒世作者西周生考〉，《大陸雜誌》第 3 期，1958 年 8 月，頁 7-9。
- 吳燕娜：〈《醒世姻緣傳》的版本問題〉，《中外文學》第 17 卷第 2 期，1988 年 7 月，頁 97-107。
- 呂妙芬：〈陽明學者的講會與友論〉，《漢學研究》第 17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頁 79-104。
- 金性堯：〈醒世姻緣傳作者非蒲松齡說〉，收入《金性堯全集》第四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年。
- 胡萬川：〈關於《醒世姻緣傳》的成書年代〉，《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263-273。
- 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徐北文：〈醒世姻緣傳簡論〉，收入《醒世姻緣傳》卷首，山東：齊魯書社，1980 年。
- 徐志摩：〈《醒世姻緣傳》序〉，《徐志摩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95 年。
- 徐朔方：〈論《醒世姻緣傳》及其與《金瓶梅》的關係〉，《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他》，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161-181。
- 袁世碩：〈《醒世姻緣傳》考證〉，收入西周生：《醒世姻緣傳》，臺北：三民書局，2000 年。
- 曹大為：〈《醒世姻緣傳》作於明末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1988 年 8 月，頁 64-71。
- 曹大為：〈《醒世姻緣傳》的版本源流與成書年代問題〉，《文史》第 2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217-238。
- 陳維昭：〈論歷史演義的文體定位〉，《明清小說研究》第 1 期，2000 年 3 月，頁 33-43。
- 楊春宇：〈《醒世姻緣傳》的研究序說——關於版本和成書年代問題〉，《明清小說

- 研究》第2期，2003年6月，頁155-170。
- 楊緒容：〈「演義」的生成〉，《文學評論》第6期，2010年11月，頁98-103。
- 鄒宗良：〈《醒世姻緣傳》的歷史地位與寫作年代上下限的推考〉，《醒世姻緣傳（下）》，頁1359-1380。
- 鄒宗良：〈《醒世姻緣傳》康熙成書說駁議——《醒世姻緣傳》寫作年代考之一〉，《社會科學》第6期，1989年12月，頁39-44。
- 廖肇亨：〈脫軌·錯位·歸返——《醒世姻緣傳》中的懺罪書寫與河川文化的相互投影〉，《文與哲》第18期，2011年6月，頁515-546。
- 趙苕狂：〈醒世姻緣考〉，收入《足本醒世姻緣傳》卷首，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
- 趙園：〈亂世友道——明清之際有關「朋友」一倫的言說的分析〉，《甘肅社會科學》第1期2006年1月，頁77-83。
- 劉勇強：〈演義述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1993年4月，頁47-51。
- 劉瓊云：〈妖魔、動物、精怪：《醒世姻緣傳》中的記惡書寫〉，《清華中文學報》第11期，2014年6月，頁103-157。
- 譚帆：〈「演義」考〉，《文學遺產》第2期，2002年3月，頁101-144。

## 2、專書

- （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四大奇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
- 李志宏：《「演義」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 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
- 胡衍南：《金瓶梅到紅樓夢——明代長篇世情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 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
- 張清吉：《醒世姻緣傳新考》，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趙毓龍、劉磊、陳麗平著：《明清小說倫理敘事研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